

到底有没有「成功学」

张欣

现在的新科技、新思维、新模式、新名词特别多，当然新的骗术也随之层出不穷。皆因我们有一个朴素想法，这件事目前我没搞懂但它绝对存在绝对正确绝对可以帮助我成功。然后就被各种套路带进了“成功学”的迷宫。

绕来绕去无非都是掉进传销或者非法集资的深坑。

相信成功学的人也多是本人或者自己的企业陷入了困境，便寄希望于有人能带他们走出泥潭。这种愿望使骗子画巨大的饼，发达赚钱上市这样的词汇随口就来，令我们深信伟大的“成功学”已经呼之欲出。

然而在我看来，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成功学”。

那些所谓成功的人无外乎就是每天辛苦的劳作，开始时是大家一起做，然后由于各种原因有些人放弃了，有些人做还是做，不过中间要兼顾一些享受，打游戏下午茶逛街八卦不断地换异性朋友等等，还有一些人是边做边找其他机会，此处只是跳板而已。

总之之后就剩下那一个人还在埋头干活，无穷无尽不眠不休。这个人就是成功的人。

也许有人会说，我就是那个人啊，可我并没有成功。

这也很对，因为成功从来不是大概率事件不是安慰奖人人有份。并且从未有人可以承诺你只有吃尽了这些苦就能得到成功的勋章。所以失败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开始一件事时都是抱着成功的向往，很多人甚至连后路都没想过，只想着成功后怎么风光怎么分钱怎么享受人生。就像有一对夫妻就想着买彩票中奖后怎么分钱一不小心就吵起来了，还没中奖就离了婚。这些都正常，所以失败也很正常对不对。

或许还会有人说，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是有迹可循有规律可参考可总结的，不可能成功这件事就那么虚无缥缈找不到任何头绪。

当然，成功的确是有方法的，那也非常简单，就是自己在做人或者做事上出现了问题，于是本来就难以碰到的运气也随之溜走。

先说做事，各种经验教训都从实践中来，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都有一个过程，所以就是不能着急，必须一个地去解决问题。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无数次的失败或者碰壁直至了无生息。

你看真正成功的人根本不会乱说话那是因为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已经耗尽了气力，什么都不想说了。

然后就是做人。曾国藩也好王阳明也好，总之智者说到的如何做人我们都相当熟悉，只是有些说到做不到而已。我有一个朋友一直是公司副总，她就是踏实诚恳为人谦让替自己想得少扑下身子忘我工作的人。后来她生病过世了这个公司也就倒闭了，为什么，因为她在，公司老总只负责抛头露面表演性发言，上电视找人写书为自己立传，到处喝酒应酬非常风光，看上去绝对是一个成功人士。但是这个神话还是被我的朋友带走了，灰飞烟灭了。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成功的人大致相同，不成功的人各有各的问题。

而所谓的成功学就是一个永远看得见又摸不着的金苹果，任何古老的骗术都可以借题发挥把我们给绕进去。

我家珍藏着两张珍贵的照片。一张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微笑着与我母亲朱英如握手，另一张是慈祥的宋庆龄副主席满面笑容地与母亲同进午餐。看到这些照片，我就回想起母亲朱英如革命的一生。

母亲曾是个少言寡语的“吃素姑娘”，工人运动的兴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像春雷震撼着中华大地，也唤醒了母亲。1925年6月，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党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母亲也英勇参加了这几场战斗。同年11月，母亲不幸被捕入狱。当时，她身上有份党员名单，被捕后，她急忙把名单塞到嘴里。受审讯时，她就称自己“不晓得”“不识字”。敌人气极了，打她耳光、她就骂，于是，敌人就用皮鞋乱踢，用鞭子抽，她的皮肉都裂了开来。

被捕后，母亲发现住在前楼的谢庆斋同志也被抓进来了。敌人在谢家搜出一些文字印刷品，母亲抱定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挽救战友的决心，一口咬定印刷品是自己捡来放在谢家，准备生炉子用的，以此减轻谢庆斋同志的“罪状”。

被捕时，母亲已有几个月身孕。直至快临盆，敌人也不准她保外分娩，甚至连热水也不给。后来，

难友们就把自己喝的开水省下来，送给她的孩子洗身。孩子出生后，看守要把孩子送去贼巢、拯救灵魂。母亲说：“我没罪，也不要拯救什么灵魂。”她坚持把这个革命后代保了下来，他就是我的哥哥沈鹏里，长大后也参加了革命、入了党。

1932年1月，母亲“刑满”释

放。出狱后的日子，衣食无着，但即使生活再艰苦，她也始终怀着坚定的信念：“我要继续为党工作。”

1938年底，母亲来到中央玻璃厂当宿舍管理员，那家厂的工人集体宿舍在松路路明德里3-5号，我们一家就住在这里，工人们晚上回来，母亲就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讲大革命时期的故事，那个宿舍区先后有12名工人参加了新四军或抗日游击队。

1946年，母亲重新回到了党的组织，明德里也成了党的“联络站”，她利用明德里的有利环境，收听延安广播，油印宣传品，保存党的文件。她还利用敌人节节败退的有利时机进行策反工作。

上海解放前夕，母亲的工作更

前一阵子，朋友圈都在转一则趣闻——朱东润先生执复旦大学教席时，有一天某教师拿着自己写的论文向朱先生请教。朱先生看后道：“论文写得可以，只是你的字还得练练呐！”说得某教师很难为情。朱先生见状，便微笑着对他说：“当然，你也不必花太多的功夫，能写到郭绍虞那样就行了。”

从这则现代版“世说新语”来看，朱先生对于自己的书法水平，自视极高，明显不把书法造诣颇深的郭绍虞先生放在眼里。

郭朱两位先生的字，一般人难得见到。不过，凡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读过中文系的人，大概率会备一套《中国历代文学论选》（郭绍虞主编）和《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主编）。这两套书封面上的题签，前者是郭绍虞先生的，后者是朱东润先生的，堪称双璧。

除了书法上的造诣和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先生还有《张居正大传》等古代人物传记作品及大量的古代文史研究、整理成果，那就给读者留下了一

在影视频道收看党的十九大献礼影片《党员登记表》，这是根据作家峻青的同名小说改编，是他继六十多年后又一部被搬上银幕的文学作品。可是，峻青先生于年前去世了，他的“红色经典”作品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珍贵的记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转业进作协。当时的主席团成员中有好几位早年投身革命，又创作出我喜爱的战争题材作品的老前辈。峻青是其中一位，他的电影《黎明的河边》，还有电视连续剧《海啸》都是我常看不厌的，被收入课本的《老水牛爷爷》在孩童时就读得滚瓜烂熟了。

1986年，上海作协和河南省作协到浙江举行“笔会”活动。峻青为上海作协领队。出行前夕，我就读的“高复班”上，刚对峻青的《秋色赋》进行了阅读和分析，被他笔下的农民喜获丰收时的欢庆场景所陶醉。所以，行程中，我与

加繁忙了。地下党调查来的很多敌人重要设施的档案资料，都由母亲保管。她戴着老花眼镜，写出一封封信给国民党官员，进行警告和政策攻心。一叠叠“人民保安队”的袖章在明德里做好，用菜篮子掩盖着发送出去。有一部分敌军从前线撤退下来住在明德里工房，母亲抓紧时间做策反工作。解放军一打进上海，母亲就发动群众包围那些敌军，迫使他们缴械投降。

1957年，在一个参加过三次起义的老工人座谈会上，母亲又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周总理亲切地和她握手，回忆起三次武装起义中，那个扎着小辫子、冒着敌人枪弹奋战的女工，周总理对她讲：“人退休了，革命可不能退休啊！”退休后，母亲曾三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1958年10月17日，宋庆龄国家副主席视察国棉十七厂时接见了母亲并与她在职工食堂共进午餐。

从“吃素姑娘”到党的英勇斗士，1964年母亲走完了有意义的66年人生，长眠于龙华烈士陵园。

诗三百历经千年依然动人心扉，明起刊登一组《诗经》里的爱情。

责编：王瑜明

寻找100份红色记忆

沈依依

梅花香自苦寒来

陆正伟

他们时，我见峻青上前安慰道：“路走错总会有的，只要回来就好。”诙谐的言语帮他俩解了围。

回上海不久，收到峻青送我的《履痕集》签名本。读罢“序言”，感到“笔会”虽结束，他仍关心着我。序中写道：“在旅行中，应该如饥似渴地广闻博记，随时随地注意和分析、研究所接触的生活……不仅要记录下所见所闻，而且还要抒发自己的情感和见解。”我从言传身教中看出他送我书的意图了。

此后，我与峻青的联系多了，交谈话也广了。一次，在他家闲聊时他说要送画给我。事前，我见过他在国内外举办画展的新闻报道，也听到老作家魏绍昌的介绍，说峻青作画出道比作文早，他五六岁时就开始临摹《芥子园画谱》。任武工队小队长时，他还创作发表了一套抗日题材的连环画《铁西瓜》……

在峻青的画室里，我见他在画桌上泼墨挥毫，宣纸上渐渐现出道劲的梅树，枝头上绽开着鲜红的花，还有含苞欲放的花蕾。《墨梅图》完成后，他在画上题款：“梅花香自

润先生究竟翻译了多少外国文学作品，也没有深入了解他翻译了哪些国家的哪些作品，就目前被认为“名家名著”的，竟然都是托尔斯泰的作品，如《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第一卷中就收入了朱东润翻译的《克里米战血录》，它与林纾、伍光建、徐卓呆、陈赟、吴棹等“五四”前已经非常出名的翻译家所翻译的外国长篇小說“同框”。可见主编施蛰存先生非常看重朱东润先生的译品。

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三本托尔斯泰作品的单行本；一是林纾和陈家麟合译的《罗刹因果录》；二是雪生译的《雪花围》；还有一本，是朱世溱翻译的《骠骑父子》（现作《两个骠骑兵》）。191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几部托翁创作的中篇小说，如，由陈家麟和陈大镗合译的《安娜小史》（即《安娜·卡列尼娜》）、由朱世溱翻译的《克里米战血录》（原载于《小说汇刊》第41期，现作《塞瓦斯托波尔尔的故事》）。

我没有统计过这段时间朱东

他们时，我见峻青上前安慰道：“路走错总会有的，只要回来就好。”诙谐的言语帮他俩解了围。

回上海不久，收到峻青送我的《履痕集》签名本。读罢“序言”，感到“笔会”虽结束，他仍关心着我。序中写道：“在旅行中，应该如饥似渴地广闻博记，随时随地注意和分析、研究所接触的生活……不仅要记录下所见所闻，而且还要抒发自己的情感和见解。”我从言传身教中看出他送我书的意图了。

此后，我与峻青的联系多了，交谈话也广了。一次，在他家闲聊时他说要送画给我。事前，我见过他在国内外举办画展的新闻报道，也听到老作家魏绍昌的介绍，说峻青作画出道比作文早，他五六岁时就开始临摹《芥子园画谱》。任武工队小队长时，他还创作发表了一套抗日题材的连环画《铁西瓜》……

在峻青的画室里，我见他在画桌上泼墨挥毫，宣纸上渐渐现出道劲的梅树，枝头上绽开着鲜红的花，还有含苞欲放的花蕾。《墨梅图》完成后，他在画上题款：“梅花香自

晚上11点的铁路上海虹桥站完全看不出夜晚的安静与放松。接连不断到来的出租车和拖着的行李箱与地面摩擦的声音，显得忙碌和紧张。上海是个潮湿的地方，湿润中有着热烈。

我骑自行车去思南公馆，意外地在思南读书会公告牌上发现有青年作家王若虚的名字。我曾经梦想去上海参加《萌芽》杂志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我想象着在那里遇见那些我所喜欢的但只能在梦里见到的文学青年，有点哽咽，因为那时我没有为梦想而进发。

上海菜偏甜，这让生活在海边口味重的我，一下子难以适应，但却好吃。上海菜精致，从摆盘至盛放器皿都细腻雅致，即便不吃，看着也满心愉悦。包油条还要放糖的粢饭，真是令人难忘。

我流连在旧的石库门，窄的街道，有竹篱笆墙的花园洋房，那是上海的“根”。我也去了人民广场和南京路步行街，我看到小吃店里的炸鸡真的比脸还大。黄浦江的风温婉柔和，让人舒服到可以起

飞。在外滩散步的人很多，有单身觅食的，也有交颈之人你依我依。在外滩，可以把江边夜景尽收眼底，想见的色彩夺目，不想见的也在江水里澎湃激荡。

如果说车站是听故事的好地方，那我会说，马路也是。在浦东陆家嘴一带，望着那些穿越人行道的衣着精美、芳香扑鼻的白领女子，我特别想听听她们的故事，但她们步履匆匆，转眼就消失在上海中心或东方明珠的投影里。

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那几天，我最喜欢的是傍晚的时候，坐在落地窗前，看着天空的颜色一点点加深，看着来往的游轮，看着只有一盏灯的船和江面上反射的光。我知道这里有许许多多的传说。我想起了一部有关苏州河的电影，男主角坐着小船漂在河上，说是会一直去寻找一个女孩。电影结束的时候，我特别害怕那个女孩永远留在了河里。谁知道呢？谁又在寻找呢？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很想以后还要再一次一次地遇见上海。

《骠骑父子》出版时，朱先生还在留学；《克里米战血录》出版时，朱先生早已回国，因此也有在国内翻译（或部分翻译）的可能。

问题是，一个留英的学生为什么会去翻译一个俄国作家的作品？是不是因为托尔斯泰刚去世不久（1910年11月20日）？我无从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朱东润先生翻译的托翁作品是从英译本转译的——他曾说过，自己的英语水平虽然不高，但比起林纾来总要好得多……

从托尔斯泰作品在中国的流传情况看，我们可以清楚地梳理出：至少在中篇小说（清末民初可能归为长篇小说）领域，朱东润先生，一方面，属于最早一批翻译者之一；另一方面，眼光出奇的好，《两个骠骑兵》和《塞瓦斯托波尔尔的故事》即使以当今文学批评的理念来审视，称之为托翁代表作之一，完全没有问题。

遗憾的是，朱东润先生作为中国最早的托尔斯泰作品翻译者之一，并不为广大读者所知。或许，人们不了解“朱世溱”就是“朱东润”，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吧。



西湖醋鱼（中国画）晁芷璐（八岁）

苦寒来。陆正伟同志雅鉴，一九九三年冬。峻青。”

文友桃林兄受《墨梅图》启发，在峻青喜逢85华诞时，他创意设计了一款用梅杆作壶把，梅枝为壶纽，梅桩作壶嘴的“梅壶”。那天，峻青手捧生坯欣然提笔在上面作起画来。此时，我见客厅里挂着峻青与老友赖少其合画的六尺整张《梅花图》，书桌、书橱里摆着各种“梅瓶”“梅盘”，再看他在“梅壶”上作“梅画”配“梅诗”，我仿佛身处暗香浮动的梅树林里了。

我见在壶上画的梅花

与送我的《墨梅图》几乎雷同。此画为何反复画呢？正嘀咕时，峻青停笔道出了原委。多年前，老友丁玲向他求“梅画”。没想到，丁玲于1987年3月驾鹤西归，峻青怀着沉痛之情，在丁玲逝世一周年时写了万言悼文——《梅魂》。又精心画了幅《墨梅图》转交给丁玲丈夫陈明，了却了故人的遗愿。说完，他引用《梅魂》中的诗句“纵横老干真堪画，几度风霜琢炼来。”书写到壶上。我在吟诵时逐渐领悟峻青的爱梅情结，同时也品出了他对丁玲无尽的思念。

初识上海

徐欣桐

徐欣桐

徐欣桐

徐欣桐

徐欣桐